

杭州中院刑二庭:

“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先进集体”，是荣誉也是责任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钟法

从受理到宣判5个多月，庭前会议和庭审历时8天5晚，判决书长达172页、10.5万余字。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下沙董纪福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案作出一审判决，所有被告人均一人犯数罪，其中主犯董纪福一人犯13罪，法院依法予以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5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黑恶不除，民心难安。2018年2月，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后，杭州中院便迅速成立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领导小组，并将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刑二庭，负责杭州全市法院专项斗争工作的开展、指导和协调。截至2020年底，杭州法院受理一审黑恶案件464件，审结462件；杭州中院刑二庭受理二审黑恶案件165件，审结164件，案件审结数和被告人人数均居全省第一。生效并移送执行的黑恶案件中，财产刑判决金额6.21亿元，已执行金额5.87亿余元；追缴没收违法所得判决金额7600万余元，已执行金额7500万余元，执行到位率均99%以上。

咬定三年为期目标不放松，杭州中院刑二庭迎来高光时刻——在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总结表彰大会上，荣获“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先进集体”称号。

“专项行动已经结束，但并不意味着扫黑除恶终结。”庭长朱敏明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是荣誉，也是沉甸甸的担子。”

办理黑恶犯罪案件的女法官会是什么样的？记者眼前的朱敏明温润谦和，可实际上她已在刑事审判的岗位上24年了，以前在刑一庭工作，主要审理重大疑难刑事案件，也就是被告人有可能被判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案子，“性子偏‘弱’可不行。”她笑言。

后来朱敏明从刑一庭转到刑二庭，和庭里的干警全身心扑在了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上。“‘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在杭州以往的刑事审判中其实鲜有判例。”朱敏明说。像下沙“董氏家族”案，董纪福兄弟俩都是下沙本地人，长相普通，过去都做着自己的本行生意，看起来似乎和“黑恶势力”搭不上边。

翻阅一叠叠卷宗，朱敏明注意到，兄弟俩多年前强强联合，介入下沙众多建设工程，一步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为了抢生意，董氏兄弟网罗了一帮打手，以各种非法手段将竞争对手逼退，这期间，言语和肢体“问候”自然是少不了的。

“在涉黑恶案件中，如何定性极为重要。”朱敏明说。判决书描述道，“该组织大肆进行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在杭州市下沙地区多个行业形成非法控制或重大影响，攫取巨额非法经济利益，严重破坏当地经济秩序、社会生活秩序和公共管理秩序，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危害后果十分严重，应依法从严惩处。”目前，该案正在浙江省高院二审。

“作为中级法院的刑二庭，提高基层法官对涉黑恶案件的法律适用和政策把握能力也是工作重点。”朱敏明

说。某基层法院判决的一起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被告人提出上诉，中院二审审查发现，主要成员作为村民组长、代表，都是临时纠集村民实施犯罪，没有形成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不符合犯罪集团的认定标准，对于一审判决予以纠正。

另外，在刑二庭的指导下，全市共对20余件指控黑恶犯罪案件，判决依法纠正了一些黑恶性质方面的认定偏差。

“要让每起案件、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朱敏明表示，“我们始终遵循严把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既不降格也不拔高的原则，确保将每起案件办成铁案。

以信念坚守初心。刑二庭29名干警全身心投入工作，实行挂图作战，确保案件清结，为此每个人都像绷紧的皮筋。“是每个人。”朱敏明强调，因为哪怕有一个人掉链子，都不可能完满完成任务。不到三十岁的法官助理，某天突发耳聋，医生诊断是过度疲劳、精神压力过大所致；家中有两名幼儿的男法官为了啃下“硬骨头”，干脆住在办公室……

获得荣誉称号，庭里每位法官都很激动，三年的努力得到了高度认可，但也感到莫大的责任。从专项斗争转向常态化打击，接下来该怎么干？朱敏明说，刑二庭正在“回头看”和“调研”上发力，“针对专项斗争中暴露出来的普遍性、深层次问题，尤其是黑恶势力滋生蔓延的重点领域进行调研，期待建立起源头治理为根本的长效机制。”

青春向党 红色追梦

昨天，由杭州市西湖区律师行业党委、西湖区司法局机关党支部主办，浙江一墨律师事务所党支部承办的星光电影党课活动在德信影城举行。参加活动的全体党员重温了入党誓词，并集体观看了优秀国产影片《青春之骏》。

据了解，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西湖区律师行业党委在星光影视和院线的支持下，推出了“青春向党 红色追梦”星光电影党课活动，后续还会推出形式更多样的党课活动，将艺术和党史学习教育创新融合，让党史学习教育有表情、有色彩、有温度。

本报记者 章锐 通讯员 沈晓琴

“醉驾入刑”十年 浙江醉驾数下降10%

本报首席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陈谊

本报讯 2021年5月1日是“醉驾入刑”十周年。十年来，浙江查处酒驾越来越严，酒驾数量明显下降，醉驾也得到一定程度遏制。五年前，记者从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获悉一组数据：2010年，浙江查处酒驾24.8万起，其中醉驾2.6万余起；2020年，全省查获酒驾9.6万起，其中醉驾2.3万起。与此同时，浙江汽车保有量由2010年的544万辆增加至2020年的1774万辆。这十年，汽车总量增加3.2倍，查获酒驾数量减少2.5倍，其中醉驾数下降10%。

浙江酒驾的查处量很高，是不是浙江喝酒开车的人特别多？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秩序支队负责人对此表示否定，“这是因为浙江查处酒驾力度特别大，对酒驾坚决实行‘零容忍’”。

这位负责人介绍，从近三年查获的酒驾案例分析，主要有以下特征：一是男性司机较多，占比96.7%，女性司机酒驾比例有逐年上升趋势；二是酒驾人员年龄呈抛物线状分布，30至39岁达到峰值，占33%；三是一人多次酒驾的占比较高，有5.6万人，其中最高记录1人9次酒驾被查。

近年来，浙江严查酒驾力度持续加大。各地坚持常态严管和专项整治相结合，采取异地用警、警种联动、执法直播等形式开展路查路检，并聚焦餐饮娱乐场所周边道路、事故易发点段、城郊接合部以及农村道路等重点区域，突出节假日、后半夜等重点时间节点，不定时不定点开展集中统一行动。同时还通过大数据研判科学调度勤务、合理安排点位，对酒驾醉驾违法行为实行精准打击。

据悉，十年间，全省共查处酒驾99.9万起，其中醉驾20.3万起，查处总量居全国首位；涉酒交通事故明显下降，涉酒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从2010年的128人降至2020年的77人，下降40%。

五一临近，走亲访友频繁，酒后驾车风险增大。据悉，从2021年4月26日起至5月5日，浙江将开展酒驾醉驾专项集中整治行动。整治前两日，全省已经出动警力1万余人次，设置酒驾整治点904个，查获酒驾541起，其中醉驾124起。

窨井盖被强行打开？几秒钟系统就自动告警

本报记者 陈贞妃 通讯员 缪婷

窨井盖未经申请被强行打开，几秒钟内后台自动告警，电子地图精准定位，10分钟后维修人员抵达现场——近日，在嘉善县数字城管中心，一场“智能井盖故障报警应急处置演练”让记者直观地感受到了当地“井盖数字化改革”带来的便利。

在数字城管中心的大屏幕上，嘉善全县4万多个窨井盖都被绘制在一张电子地图上。“不同的图标代表不同类型的窨井盖，点中每个图标会自动显示窨井盖的权属部门等详细信息。”工作人员介绍，这是去年以来，嘉善县检察院落实“四号检察建议”，加强窨井盖管理、推动管理创新带来的有效成果。

窨井盖设施管理直接影响市民的脚底安全。可在城市道路中，成千上万的窨井盖分别隶属不同的部门或单位，权属复杂直接导致监管缺位。去年以来，嘉善县检察院针对县域内窨井盖管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向相关责任部门发出检察建议书，并联合开展了一系列城市窨井盖专项整治。

“首先确定了每个窨井盖的权属单位和责任部门。”去年6月，嘉善县检察院在全面排摸的基础上，联合多部门相继制定了《关于加强窨井盖管理和打击涉窨井盖相关犯罪的工作机制》《嘉善县管线井盖整治专项行动方案》，以“谁受益，谁担责”为原则，落实管理维护责任，绘制管线井盖图、编制应急处置流程表，

为4万多个窨井盖建立“身份”账册，并同步接入数字城管平台。

“发现问题窨井盖，网格巡查员可以通过手机APP拍照上传，市民也可以拨打110报警提供地理位置信息。”县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孙高强介绍，管理人员收到报修申请后，立即向窨井盖的权属单位派单，启动应急处置，确保及时修复。

去年9月，在检察院的敦促下，当地住建部门还结合打造智慧城市需求，利用物联网技术建立了“智慧井盖监控管理系统”，为窨井盖配备“芯片”身份证件，通过数字化监控系统对窨井盖及窨井进行实时监控。“窨井盖若要打开，必须在管理APP上提交开盖申请。否则，一旦窨井盖出现移位、破损、塌陷等情况，后台的井盖状态就会显示异常告警。”孙高强说，系统还能对井下液位高度、井内有害气体等进行实时监控，“值得一提的是，每个智能井盖都配备了定位系统，即便有人强行撬走，也能通过定位及时追回来”。

目前，嘉善城区内的690个窨井盖已经完成了智能化改造，后续将在全县铺开。

推进政法数字化改革

本报职业道德监督电话:0571-85310013